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

卷三

程千帆題



麗文文化事業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

卷三

程千帆題 



麗文文藝事業

宋代文學研究面面觀（代序）

在本刊第二期的〈代序〉中，對於如何提高研究成果，筆者強調三個重要途徑：一、材料生新；二、方法獨特；三、觀點殊異；很令人欣慰的，在本期刊登的論著中，皆有一定的呈現與示範。

有關宋代文學研究之論著，本期共選刊三十五篇，其中就材料生新，拓展讀者視野而言，黃文吉〈詞學的新發現——明抄本《天機餘錦》之成書及其價值〉一文，值得推介。珍藏在臺北國家圖書館的明抄本《天機餘錦》，經黃先生考察探究，於是內容清楚，來源分明。同時發現編者非程敏政，成書在嘉靖萬曆年間；在校勘與輯佚方面，更具保存詞學文獻之價值。發現新資料，可以厚實研究基礎，觸發研究視角，廣化深化研究成果，如一九八四年左右，孔凡禮先生在北京圖書館發現明初稿本《詩淵》二十五冊，對於宋詩與宋詞之研究，提供了許多散佚之作品（註一）。朝鮮活字本《王荊文公詩李壁注》，注文較通行本多出一倍，對研究王安石詩歌及宋代文學和歷史，皆有重要之參考價值，則為王水照先生於一九八四年在日本蓬左文庫所發現（註二）。顧易生王水照先生又於蓬左文庫發現施宿《東坡先生年譜》二種，久佚重見，對於東坡傳記研究，又多一項佐證資料（註三）。嚴羽、劉辰翁評點《李杜全集》四十二卷，河北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各有藏本，近年學者考證，或以為南宋評點學、詩學之鉅構，或以為出於嘉靖萬曆年間後人之偽託（註四）；是非疑似，值得進一步考辨探索。其他，如江西修水縣圖書館藏有《黃律卮言》海內孤本，為研究黃庭堅七律詩可貴資料（註五）；亦有參考價值。總之，新材料發現，都將是學界之盛事，可以激發許多研究，善加利用，可以解決許多學術懸案，產生許多令人刮目相看之成果。無論公私館藏，海內外書庫，乃至於類書叢書之中，都可能發現新大陸，發現新寶藏，要在學人如何探索利用而已。本期刊載李燕新〈王安石偽詩考辨〉、薛玉坤〈晏殊佚文輯考〉二文，分別考辨三十六首偽詩，輯得佚文十四篇，發現這些材料，對於研究王安石詩歌及晏殊文學，

在全面掌握文獻上，深具意義。考據是文學研究的基礎，這是不容否認的。

方法，是解決問題的有效工具，適切而良好的方法將有助研究成果的開拓與提昇。本期有五篇論著，巧妙運用研究方法，獲得可觀之成果：龔鵬程〈從杜甫、韓愈到宋詩的形成〉，就風格系統與詩史流變兩大端探討宋詩之特色，接受學中的「誤讀理論」，提供詮釋問題，辨章學術的依據。對於宋詩特色的形成，提出了另類嶄新的思考。而羅秀美〈宋代陶學轉變的原因及其意義〉，則立足典範學說，運用接受理論，以討論宋代陶詩學生成之意義。衣若芬〈蘇轍〈韓幹三馬〉及其次韻詩〉，採用比較研究之法，仔細比對蘇轍〈韓幹三馬〉，與蘇軾、王欽臣、劉攽、蘇頌、黃庭堅諸人六首次韻唱和詩，宋人題詠、鑑賞、次韻、品評之風尚，可以概見。趙梅〈關於詞的本體論思考——從意象出發〉，一方面從符號系統討論詞的獨特意象——是運用結構主義的文學研究方法；一方面又從因革損益的歷史視角，看意象的流變；再從意象的組合，來看詞境的狹深、隱曲、迷離，如此論說，頗有創意。黃奕珍〈讀〈後赤壁賦〉——由「追蹤前遊」意圖之逐步破滅談起〉，則掌握符號學原理，以散文理論為依據，運用解構主義文學研究法，就耳熟能詳之〈後赤壁賦〉作不同凡響之解讀。可見能夠適切運用相關之研究方法，彷彿榮獲《笑得好》中那位老神仙的真傳，就可以任隨我意，到處「點石成金」，一生受用不盡。除此之外，研究法尚有社會學方法、心理學方法、比較文學方法、現象學文學研究法、結構主義文學方法、以及自然科學方法的借鑑等等（註六），亦間有學者加以採用。北京中華書局《文史知識》每期刊登博學鴻儒「治學之道」專欄，江蘇古籍出版社《古典文學知識》亦逐期刊載學者專家「治學門徑」，無論傳統或現代的方法，對讀者多有啟悟，皆有參考價值。葉嘉瑩先生曾主張：「借用一些西方文論，來對中國這些傳統的詞說略作反思和探討」；盡心致力如此，將可以從一個較廣且較新的角度，為中國的詞學在世界文化的大座標中，找到一個適當而正確的位置（註七）。不只詞，研究其他宋代文學亦然！諺云：「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葉先生這段話，值得反思與力行。

東坡〈題西林壁〉詩「橫看成嶺縱成峰」云云，提出觀賞廬山最少有七種角度，對研究視角的選擇有極形象性之啟示。本期論著，大多視角獨特，

不因襲前人，如張雙英〈論「宋詩」的特色及其形成的主要背景——以詩人的時間與空間為基點的考察〉一文，論宋詩特色，從「詩史」的角度，以時間與空間為基點，將研究的觀點擴大到整個宋代詩壇，對於宋詩特色之深刻理解，大有裨益。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宋代詩學——以宋人筆記為例〉，選擇宋人筆記，提煉其中「以《春秋》書法論詩」之資料，論證微婉顯晦等五大書法在宋代詩論中之運用；宋代詩學注重以會通和成方式論詩作詩，本文為系列詮釋觀點之一，可與「出位之思」命題合看。周裕鍇〈禪宗言意觀的演變：由不立文字到不離文字〉，從「言意觀」切入，論述原始禪宗與宋代禪宗之演化變異，由運水搬柴之農禪演變到「以筆硯為佛事」的士大夫禪，由「不立文字」演變到「不離文字」，論禪宗的演變，選擇「言意觀」作為探討視角，堪稱精當無二。禪宗與宋代詩學之關係，盤根錯節，有待整理廓清，林湘華〈禪宗「二道相因」的思維方式與宋代詩論〉，乃選取「二道相因」「對法」為視點，進而闡論禪思與詩思間之融通，為「詩禪會通」之宋代詩學，提供了新穎之探討活路。楊文雄〈宋代李白詩的流波與影響〉，選定宋人對李白詩的接受反應為研究視角，從李白杜甫作品優劣、地位升降的演變中，探討宋人對李白的曲解和誤解。作者有意從接受史的視角來研究宋代詩學，值得借鑑。唐宋詩之爭，為明清詩學批評之熱門話題，張仲謀〈王漁洋與「宋詩」的因緣離合〉，選擇出唐入宋的王士禛作為研究視角，頗有代表性，無論詩學主張或創作傾向之探討，鼎嘗一臠，皆可見其中之曲折變化。周益忠〈由詠史詩看西崑體與義山體的異同——兼論二者在詠史詩發展史上的意義〉——論西崑體與義山體的異同，選定詠史詩作為研究之視角，可謂覷定萬山磅礴之主峰，挈住龍袞九章之一領，成果自然是可觀的。對於唐宋詞作多角度多層面的研究與發掘，蘇州大學楊海明教授堪稱此中射雕手，本期所刊〈聯繫人生問題讀詞〉一文，強調以「人生」作為讀詞論詞的切入口，可以順滑地剖開唐宋詞的「詞心」，是在風格論、詞史觀、美學論外的另類視角，值得參考。唐宋詞的審美意義，近年探討極多，吳惠娟別開生面，撰作〈淺論唐宋詞表達的情感層次〉，拈出「情感層次」，作為研討唐宋詞審美的觀點，無論自然的情感或深化的情感，多更見其美感價值。曹治平〈「長歌之哀，過於痛哭」——論宋代傷悼詞的審美價值〉，選題避

熟就生，研討宋詞中有關死訣永別之悲痛，剖析其感情內容，藝術結構、悲劇意象，挖掘其文化意蘊，探討其審美價值。辛棄疾詞作之研究，為三四十年來詞學界之顯學，偉論如林，突破不易，鄧紅梅〈論辛詞「好稱淵明」的原因與價值〉一文，特別關注辛棄疾稱引陶淵明之十六首詞，剖析其喜好之緣因，比較辛陶二家之人格類型，而要以莊子人生哲學為依歸，對於探索唐宋文人的心態，極具意義。歐陽脩〈醉翁亭記〉，蘇軾〈後赤壁賦〉、〈放鶴亭記〉，並皆傳世不朽、膾炙人口，諸家稱美說妙，可謂擷撷殆盡。後人研究如果亦步亦趨，只得死於句下，王更生先生〈由園林美學看〈醉翁亭記〉的結構藝術〉、以及康韻梅〈試由〈放鶴亭記〉、〈後赤壁賦〉的鶴意象論蘇軾「文」「心」的進程〉二文，大大不然：王文從園林美學來解讀〈醉翁亭記〉，康文從孤鶴意象來探索蘇軾文心，所持觀點可謂不經人道，古所未有，別出心裁，另闢蹊徑。古文研究如何推陳出新？死中求活？此中自有啟悟。另外嘗試合讀康韻梅、黃奕珍所撰〈後赤壁賦〉之論述，可得見仁見智、相得益彰之妙。

專家詩、專家詞之研究，對於全面理解宋代詩詞體派、風格，不可或缺。就宋代詩人而言，《全宋詩》所收在萬家以上，有詩集傳世者六百家以上，而學界探討或稍加觸及者不出六十家，其他十分之九皆茫昧而不得知其究竟，有賴學界志士共襄盛舉，開發此一蘊藏豐富之學術園林。臺灣大學張健先生為研治宋詩之前輩，曾標舉蘇軾、陸游、楊萬里、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王安石、歐陽脩、范成大、梅堯臣為宋代十大詩人；其中除蘇軾詩研究成果較多外，其餘開發仍嫌不足，大家研究皆如是寥落，何況二三流以外的詩人？張先生〈梅堯臣的悼亡詩〉一文，選就悼亡詩的一個面向，評論梅詩中寫給亡妻、亡子、亡女之作品，論證朱熹以「枯槁」評梅詩為不足取信，吉川幸次郎所謂「筆法細膩，情感深刻」方為知音之言。宋詩大家既少獲開鑿，相對小家更乏人間津，其中癥結在詩人生平事跡研究闕如，知人論世失去憑藉，遂嚴重影響探索詩境之興趣。王兆鵬治唐宋詩詞，頗留意於史料，撰寫〈宋代詩人叢考〉，考察王鈇、翁挺二家之事跡，甚詳，頗足取法。在宋代史料大量湧現，及四川大學《中國地方志宋代人物資料索引》正式出版之際，對於考察宋代文學人物之傳記，當更便利。宋代專家詞方面，本期

有蔣哲倫先生〈論周邦彥〉一文，分別就生平分期、詩文創作、詞作類型、藝術風貌、集大成之詞史地位，以及文集之版本流傳，全面作論證探討，可謂周賅盡致，深思有得之力作。胡可先〈毛東堂詞作年考〉、曹辛華〈毛滂新考三題〉，不約而同研討北宋詞人毛滂之生平事跡：前者著重詞作之繫年考訂，後者致力於生卒年及交遊之考證，合之雙美，值得參看。傅蓉蓉〈吳文英詞簡論〉，側重探討夢窗詞在意象、結構、語言上的美學風格，探討夢窗詞風「不得不然」的文化成因，尤其用心解讀浙西詞派、常州詞派、晚清四家，乃至王國維對夢窗詞之接受變化，論述全面，值得參考。相對於上述專家詩詞的研究，宋代專家文（含辭賦、四六）之研究，尤其沈寂不振；小說研究，更乏人問津。希望《全宋文》的文獻觸發，可以打破這樣的困境。

宋代詩詞體派的研究，有助於微觀探索之精確，更便於宏觀研究之概括，本期刊登四篇力作：黃景進〈換骨、中的、活法、飽參——江西詩派理論研究〉，將換骨等四種詩法並置討論，從中凸顯出江西詩派的理論重點，江西詩派以及宋詩之發展傾向，讀者亦細案可知。文中比較黃庭堅及四家詩法之異同，由異同而見出流變，方法頗可信據。曾棗莊〈理學詩派的鼻祖——邵雍〉，全面掌握《擊壤集》文本，論述邵雍重道輕文，作詩害道之詩學主張，探討其散文化、議論化、口語化、以及不限聲律之詩歌風格，在理學詩派中頗有代表性。對於進一步研究探論甚少之其他理學派詩，有觸發借鏡意義。張福勛〈論誠齋詩的詼諧藝術〉，具體歸納出誤會、重覆、諧音、反常、打諢、調侃、對比、顛倒、疑問、數字十種詼諧法，對《滄浪詩話》所謂「誠齋體」提供新穎而堅實的詮釋視角。趙維江〈吳蔡體與稼軒體〉一文，選擇金初吳（激）蔡（松年）之詞體作研究之突破點、中介物，以探討從蘇軾到辛棄疾間詞體的演進過程，無論是詞體本質的聯繫，或詞體功能的轉化，或詞體革新之貢獻，「吳蔡體」皆堪稱稼軒體的先聲和基石。類似上述體派之探討，宋代文學各個層面的類型研究，正有待開發。就《滄浪詩話·詩體》所述，所謂以時而論的本朝體、元祐體；以人而論的東坡體、山谷體、後山體、王荊公體，邵康節體、陳簡齋體；以及雜體，學界或著墨不多，或論焉欠詳，多值得探究。其他宋代文類，更值得深淘廣掘。

關於宋代散文的研究，向稱寂寞（註八），本期刊登六篇論文，打破沈

寂，可喜可賀。王更生、黃奕珍，康韻梅諸先生大作紹介已見前述、不贅；其他三篇，亦各具特色：朱剛〈關於「文以載道」〉一文，視「文以載道」為唐宋古文運動的文章理論，影響所及，使文家持高度的理性精神貫注於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中，於是作品側重自出新意，紛紛朝真善美去作普遍性思考，促成宋人的文學自覺。理路宏通，見解新穎，頗可信據。陳致宏〈《淳南遺老集》與王若虛之散文理論〉，就文集鉤勒出原理論與方法論，時引詩論及宋代文學特質相印證，而得出文論的貢獻與價值。宋人古文批評理論散在文集、筆記、文話、題跋、評點中者，所在多有，無論文體流變，類型特點、功用申說，技法開示，或是評點理論（註九），多極富開發潛力。陳韻竹〈宋代文賦特質辨析——文賦之說理傾向〉，考察宋代文賦說理特質形成之源流，再從文體論觀點詳加辨析，對於宋代文體交融之釐清，文學亂象之梳理，有對照佐證之功。宋金辭賦之研究，是學術研究一塊處女園地，郭維森、許結所著《中國辭賦發展史》於宋金時期，已提示許多研究的選題和視點（註十），有志之士可以事半功倍作深化廣化之探勘，愛日省力，其利足多。

古典詩詞流傳至今，經過許多專家學者之解讀，多成為深信不疑的「確詁」。但，這之間，也難免有些曲解和誤讀。姑不論起於迷信權威，或是習焉不察，都有待「疑義相與析」的理解。鍾振振所撰〈中國古典詩詞的理解與誤解〉，就是這種辨疑似、定是非的有意義研究。鍾先生舉出六個遭致誤解的詩詞個案：杜牧〈泊秦淮〉、朱敦儒〈水龍吟〉、楊萬里〈初入淮河四絕句〉其四、邢俊臣〈臨江仙·詠梁師成詩〉、辛棄疾〈木蘭花慢·中秋飲酒〉、辛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諸什，其所讀解，自謙依靠「學人之拙」及「詩人之慧」；要之，皆掌握資料，嫻熟文本，獨立思考之餘，故能提出新見解，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也。

宋代文學研究，範圍極大，《詩經》學、《楚辭》學、《文選》學等等，亦包含在內，尤其是後二者，學界研究不多。本期刊登朴永煥〈晁補之的《楚辭》研究〉，可謂空谷足音。朴君論文，判定晁氏以儒家思想評論屈原與《楚辭》。晁氏對屈騷怨刺功能的發揮，以及浪漫藝術之研究，文中多有發明。像這些邊緣學科的探索，宋代文學研究也不容忽略。

本刊今年發行第三期，論文篇數多達三十五篇，無論質與量都在逐期增高中，實在令人欣慰。希望她的印行，能夠提供海內外學人一塊切磋宋代文學的研究園地，進一步促成宋代文學研究的蓬勃發展。當然，這得仰仗學界朋友的實際支持，方能有為。非常感謝本期惠賜大作的朋友，您的論文拉拔了本刊的成長；感謝內人郭芳齡，研究生林湘華、陳致宏，沒有他們細心的協助校對，出版將會推遲。更感謝麗文文化公司暨楊麗源董事長，慨助全部出版經費，本期才能順利面世。本《叢刊》要走的路，還長遠的很，希望大家群策群力，關切她的成長，就像自家的孩子一樣。

張 高 評

謹誌於成功大學中文系

一九九七年九月

註 釋

註一：詳參孔凡禮《詩淵·前言》，（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四）頁三～六。

註二：詳參王水照《王荊文公詩李壁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頁一。

註三：詳參王水照〈評久佚重見的施宿《東坡先生年譜》〉、〈記蓬左文庫舊鈔本《東坡先生年譜（外一種）》〉，載氏著《蘇軾論稿》，（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一九九四），頁三一八～三八一。

註四：詳參詹鍔《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八冊，〈《李白集》版本源流考〉，十三，嚴滄浪劉會孟評點《李杜全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六），頁四六一二～四六二三，以為嚴、劉評點為明嘉靖萬曆間人所偽託。然陳定玉〈論嚴羽評點《李太白詩集》〉，《文藝理論研究》一九九六年第一期，卻以為是「一片豐厚的理論沃土，又

理論研究》一九九六年第一期，卻以為是「一片豐厚的理論沃土，又是一片被遺忘的處女地。」頁七十八。二說不同。

註五：參考田道〈海內孤本《黃律卮言》〉，《九江師專學報》一九九四年第三、四期合刊，頁一二〇～一二一。

註六：詳參陳鳴樹《文藝學方法概論》中篇〈方法論：中國與世界〉各章所述（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一）。又，華東師範大學文學研究所編《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方法論集》，（濟南：齊魯書社，一九八七）；王春元、錢中文主編《文學理論方法論研究》，（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七），亦提出多種研究方法，頗值得參考。

註七：詳參葉嘉瑩〈從西方文論看中國詞學〉、〈從現象學到境界說〉、〈從符號與信息之關係談詩歌的衍義之詮釋的依據〉，載氏著《中國詞學的現代觀》（長沙：岳麓書社，一九九〇）。

註八：參考陳致宏、林湘華整理，張高評校讀〈民國三十五至八十五年臺灣地區宋代散文研究目錄〉，《古典文學通訊》第二十九期（一九九七年五月），頁七～十二。

註九：參考朱世英、方遁、劉國華《中國散文學通論》各篇所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

註十：參考郭維森、許結《中國辭賦發展史》，第六章〈仿漢新變期——宋金辭賦〉，（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 第三期

目 錄

宋代文學研究面面觀（代序）·····	張高評···	1
從杜甫、韓愈到宋詩的形成·····	龔鵬程···	1
論「宋詩」的特色及其形成的主要背景——以詩		
人的時間與空間為基點的考察·····	張雙英···	21
換骨、中的、活法、飽參——江西詩派理論研究·····	黃景進···	47
《春秋》書法與宋代詩學——以宋人筆記為例·····	張高評···	71
禪宗言意觀的演變——由不立文字到不離文字·····	周裕鍇···	103
禪宗「二道相因」的思維方式與宋代詩論·····	林湘華···	131
宋代陶學轉變的原因及其意義·····	羅秀美···	151
宋代李白詩的流波與影響·····	楊文雄···	189
王漁洋與宋詩的因緣離合·····	張仲謀···	215
由詠史詩看西崑體與義山體的異同——兼論二者		
在詠史詩發展史上的意義·····	周益忠···	229
梅堯臣的悼亡詩·····	張 健···	257
理學詩派的鼻祖——邵雍·····	曾棗莊···	267
王安石偽詩考辨·····	李燕新···	281
蘇轍〈韓幹三馬〉及其次韻詩·····	衣若芬···	315
論誠齋詩的詼諧藝術·····	張福勛···	331
宋代詩人叢考（一）·····	王兆鵬···	351

中國古典詩詞的理解與誤解·····	鍾振振 ···	361
詞學的新發現——明抄本《天機餘錦》之成書及 其價值·····	黃文吉 ···	381
聯繫人生問題讀詞——《唐宋词與人生》前言·····	楊海明 ···	405
淺談唐宋词表達的情感層次·····	吳惠娟 ···	415
關於詞的本體論思考——從意象出發·····	趙 梅 ···	425
「長歌之哀，過於痛哭」——論宋代傷悼詞的審美 價值·····	曹治平 ···	443
論周邦彥——《周邦彥選集》前言·····	蔣哲倫 ···	455
毛東堂詞作年考·····	胡可先 ···	481
毛滂新考三題·····	曹辛華 ···	497
論辛詞「好稱淵明」的原因與價值·····	鄧紅梅 ···	509
吳蔡體與稼軒體·····	趙維江 ···	523
吳文英詞簡論·····	傅蓉蓉 ···	539
關於「文以載道」·····	朱 剛 ···	581
《淳南遺老集》與王若虛之散文理論·····	陳致宏 ···	595
由園林美學看〈醉翁亭記〉的結構藝術·····	王更生 ···	621
晏殊佚文輯考·····	薛玉坤 ···	627
宋代文賦特質辨析——文賦之說理傾向·····	陳韻竹 ···	633
讀〈後赤壁賦〉——由「追蹤前遊」意圖之逐步 破滅談起·····	黃奕珍 ···	647
晁補之的《楚辭》研究·····	朴永煥 ···	665
試由〈放鶴亭記〉、〈後赤壁賦〉的鶴意象論蘇 軾「文」「心」的進程·····	康韻梅 ···	681

從杜甫、韓愈到宋詩的形成

佛光大學南華管理學院 龔鵬程

一

清朝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論詩之源流時，曾把南宋以後詩人統括於李白、杜甫、韓愈、蘇軾四家境界中。李白蘇軾乃是天才，但李「奄有古今，而跡未全化，亦覺真實處微不及阮陶杜韓」，蘇則「一生所得，如浮花浪蕊，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因此終不如杜韓值得學習。

這樣的批評，顯示了韓愈詩在評論者心中的份量，認為韓愈是足以與李杜並駕齊驅的詩人，而且風格及作法與杜甫甚為接近。南宋以後許多詩人則又皆可歸入杜韓這一風格體系中去。

類似此等風格史的分判，吾人略檢古今詩論，實可謂觸目皆是。最著名的，無過陳衍所說：

自咸同以來，言詩者喜分唐宋。每謂某也學唐詩、某也學宋詩。余謂唐詩至杜、韓而下，現諸變相。蘇、王、黃、陳、陸諸家，沿其波而參互錯綜，變本加厲耳。（《石遺室詩話》卷十四）

方東樹的分法，是以天才與學力分成兩系，而以杜韓代表學力這一系，並謂其影響宋詩最大。陳衍的講法，則是以杜韓為宋詩風格這一系列的宗師，謂宋詩即杜韓詩風的發展。討論唐宋詩風格差異以及詩史流變者，大抵均接受了陳衍這種講法，以說明由唐詩到宋詩的轉變。

本文從題目上看，似乎也即準備陳述這樣的觀點，描敘唐詩如何經過杜甫韓愈而發展到宋詩。

但是，凡事總要這樣，下個轉折語，底下才有好文章可以做。怎麼做呢？讓我們來看看，一、韓愈詩在唐宋之間的評價如何？真如方東樹等人所認

為的那樣高嗎？清朝人說韓詩「五古，開張處過於少陵」「七古，盛唐以後，繼少陵而霸者，唯有韓公」（施補華《峴傭說詩》）；「有唐一代，李杜韓三家，屹然鼎峙。李生而知之也，杜學而知之也，韓天人各半。李似顏子，韓似曾子，杜似孟子，各造其極者也」（胡薇元《夢痕館詩話》卷二），總是推尊甚高，但唐宋間議論或有不然。其次，把韓詩和杜詩視為一家眷屬、一個風格系統，唐宋間議論，亦不盡然。謂其影響宋詩，甚或以宋詩為杜韓詩風之發展，更是值得商榷。

二

韓愈同時代人，很少稱道他的詩，總是讚譽他的文章。連孟郊、柳宗元這麼熟的朋友，且常有詩相唱和，也找不到一句說他詩好的話。張籍曾說韓愈送了他許多詩文，「書札與詩文，重疊我笥盈」，但也只說他「公文為時帥」，不及其詩（見《張司業詩集》卷七〈祭退之〉）。這種標明出處的辦法，據說是為了符合所謂論文寫作規範。其實多虛妄。因為所引論韓愈語，均可見於《韓愈資料彙編》，故以下不再一一注明）。劉禹錫祭韓愈，則說：「子長在筆，余長在論」。李翱的祭文亦只說他在文體改革上的貢獻。此同輩友人之說也。

名輩略晚者，如趙德作其文錄序，皇甫湜為其神道碑、作其墓志銘，李漢撰其文集序，也都沒有片言隻語稱述其歌詩。是因文集未錄詩篇嗎？不然。李漢所編，收古詩二百五，聯句十一，律詩一百七十三，篇目比文章還多，卻無一語及其詩藝。顯見韓愈之詩，在他一般朋輩及師弟間，並不以為有什麼了不起，殊無值得稱道之處。

另據李肇《國史補》云：「元和以後，為文筆者學奇詭於韓愈，學苦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易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元和體」。趙璘《因話錄》也說：「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都可以證明韓愈在當時主要是以文章為世所重，雖亦能詩，但當時誰不會作詩呢？韓愈之詩藝，並未獲得肯定。

後世論韓詩，不僅推崇其詩藝，且常強調他在當時詩壇也具有宗主般的地位。如陳衍謂生澀奧衍之詩，當取法於韓愈、孟郊、樊宗師、盧仝、李賀。即是將此數人視為「一國」的。趙翼《甌北詩話》說：「遊韓門者、張籍、李翱、皇甫湜、賈島、侯喜、劉師命、張徹、張署等，昌黎皆以後輩待之。盧仝、崔立之，雖屬平交，昌黎亦不甚推重，所心折者，唯孟東野一人。……蓋昌黎本好為奇崛喬皇，而東野盤空硬語、妥帖排夏，趣尚略同，才力又相等」，則是把韓孟並列，再將韓門弟子的意義擴大，使人形成韓愈在當時詩壇上地位極高，自視亦唯孟郊足與比肩，且隱然主導一詩人集團的印象。其實在當時聲望上，韓詩是不能與孟郊方駕的。張籍等人亦非遊於韓門者。所謂「韓門弟子」，更是討論韓愈文章影響力的一個概念，完全不適用於詩歌。要把這些人含糊籠統地併入一個屬於韓愈的詩風系統裡去，實在並不容易。

三

可是，文章要有轉折，才能起波瀾，所以現在要再轉一下。研究韓愈的聲望史，不能只在他這幫朋友門生這裡看，比較能欣賞韓愈詩藝成就的，反而是那些風格和他甚為不同的人。

例如白居易，不僅常與韓愈唱和，〈久不見韓侍郎戲題四韻以寄之〉甚且說：「近來韓閣老，疏我我心知，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這是第一篇談到韓愈詩才高，且風格不喜甜美的文獻。後世論韓，常喜歡以才大、苦硬等詞語來形容，殊不知肇端乃在於此（註一）。

又，元稹，可能是當時人中最喜歡韓愈詩的，〈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因有戲贈〉云：「喜聞韓古調，兼愛近詩篇」可證。且韓愈友人張籍不甚推重李杜、韓愈寫了〈調張籍〉反駁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何用故謗傷？」，元稹大為贊成，且更進一步認為杜甫比李白更偉大，「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在談杜韓關係這一點上，元稹無疑也是鉤聯兩者關係的第一人（註二）。

講文學史的人都曉得，元白和韓孟正好代表了中晚唐兩種詩風。元白淺易，且以長慶體長律著稱，韓愈則長於古體，風格奇肆，兩者迥不相侔。就文學社會學的觀點看，貞元元和之際，白居易、元稹、劉禹錫、白行簡、李公佐等人彷彿為一文學集團，韓愈、孟郊、張籍、李翱、皇甫湜、黃頴、李賀等則為另一文學集團。李賀看不起元稹，皇甫湜瞧不起白居易（註三）。因此後世標舉杜韓詩風者，亦輒輕視元白。即或不然，亦以二家分流為說。如馬星翼《東泉詩話》卷一云：「陶詩以自然為貴，謝公以雕鏤為工，二家遂為後世詩人分途。王、孟、儲、韋，多近於陶，至香山極矣。賈島、李賀，皆源於謝，至韓孟聯句極矣」，韓白詩風，被劃然判為兩途。可是誰又知道韓愈詩在當時反倒是元白才較能欣賞呢（註四）？

這個問題，是可以擴大來談的。因為元白與韓孟的區分，可以演繹為「自然」與「雕鏤」之分，如馬星翼所說的那樣。也可以發展為「神韻」和「工力」之別，或「唐」「宋」之分的。

如袁枚《續詩品·戒偏》云：「抱杜尊韓，托足權門；苦守陶韋，貧賤驕人。偏則成魔，分唐界宋」。杜韓被視為宋詩風格之代表，陶韋則為平淡清雅詩風之代表，此派可增附入王孟元白，遂為唐詩風格；或則近於神韻一系。凡此「唐／宋」「神韻／工力」「元白／韓孟」「平易／雕刻」之分，後世判若涇渭，在當時卻出現了韓愈詩藝反而在不同風格陣營中獲得欣賞的現象，豈不怪哉？

四

更有趣的，是其詩風及論詩宗旨都迥異於韓愈的司空圖，在〈題柳柳州集後〉中不但極力稱譽韓詩，更提出了一個文學理論上的議題，引發了後世無窮爭辯（註五）：

金之精粗，效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為文為詩，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思觀文人之為詩，詩人之為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於不朽。亦猶力

巨而鬥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為勍敵也。愚常覽韓吏部歌詩數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扶電，撐扶於天地之間，物狀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所作亦為道逸，非無意於淵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深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玩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司空表聖文集》卷二）

這段話是說：詩文二體，原本各有專攻，但鑽研到極處，作詩或作文都可以表現得一樣好。像韓愈雖以文著稱，其詩固亦極佳也。

這是第一篇正面替韓愈辯護的文獻，認為文體只是表達自我的工具，大力士拿刀或持棍都同樣可以傷人，好的作者也一樣，不可能只善作文而不善作詩。但究竟詩文能否兼善呢？後世對此往往存疑。因為現實上看，能兼擅詩文者畢竟極少。杜甫的文章就寫得令人不敢恭維，誰還敢說大詩人作文一定不壞？同理，大文豪之詩也未必便佳。宋人嘗以海棠不香、鮭魚多刺、曾子固不能詩為天下三大恨事，正緣於此。此乃人之才性與文體規範相互配合之問題。世傳清方苞曾作詩呈劉公黻，劉告以：「人各有性之所近，子以後專作文，不作詩可也」，方遂終身不作詩（註六）。故司空圖以此說為韓愈勉強辯解，尚難獲得認同。

但是希望賢者無所不能，卻又是人的一種心理希冀。猶如宋人以曾鞏不能詩為恨，後代詩話就偏要找出一些曾鞏的詩來，證明他也是能作詩的。而且，這種心理可導生出一套詩文相發的理論，謂詩文雖為二體，但二體相通，詩法即是文法。且正因其相通，所以才能好。或二體同源一本，得其本則能兼善：

△詩莫難於七古。七古以才氣為主，縱橫變化，雄奇渾灑，亦由天授，不可強能。杜公、太白，天地元氣，直與《史記》相埒，二千年來，只此二人。其次，則須解古文者，而後能為之。觀韓、歐、蘇三家，章法翦裁，純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獨步千古。南宋以後，古文之傳絕，七言古詩，遂無大宗。阮亭號知詩，然不解古文，故其論亦不及此。（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十一）

△詩、古文之難工久矣，能兼工其體者尤難。柳子厚謂：「文有二